

CCTV

新时期

电视新闻改革研究

艾红红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

艾红红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艾红红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6

ISBN 7-5043-4133-9

I. 新… II. 艾… III. 电视新闻—新闻工作—改革—研究—中国 IV. G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563 号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

作 者:	艾红红
责任编辑:	贺 明
封面设计:	信 雅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东临沂市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9(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133-9/G · 1625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艾红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就要出版了,应她的要求,作为指导教师,不妨略赘序语。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电视新闻改革也逐步展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突出成就,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应当说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选题。

近年来,有关电视新闻改革的论文已陆续发表了一些,但大都比较零散,而且随感式居多。这篇学位论文的贡献在于,在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对新时期以来的电视新闻改革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带有一定总结性。论文既有对电视新闻改革进程的纵向省察,又有对电视新闻结构转型的横向剖析;既有对电视新闻改革动因的深度追寻,又有对这一改革趋势的规律性总结;最后,作者还以自己的规律性总结为依据,对我国电视新闻下一步的深化改革走向作了大胆预测和展望。我认为,这样一种思维框架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系统性和一定深度的。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一般来说其资料搜集最容易,而对其理性把握却最难。这篇论文的可贵之处,即在于通篇贯穿着一种理性意识、求索意识,尤其是关于新时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改革规律的探寻与总结部分相对来说就更显得厚重一些。通过吸收、借鉴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成果,作者认

为,在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新闻一般以纵向的“上传下达”式信息为主,偏重于政治化传播,其角色定位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喉舌”角色;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新闻则通常是以横向的“八面来风”式信息为主,偏重于信息化传播,其角色定位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守望者”角色。以此为基础,作者对新时期以来的电视新闻改革作了如下总结:其一,新时期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电视新闻传播所呈现出的可以说是一种二者兼容,即政治化传播与信息化传播并存、“喉舌”角色与“守望者”角色兼具的特征。其二,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电视新闻的信息化传播呈日趋增强态势——社会“守望者”角色逐步上台、逐步向前台行进;而政治化传播表面上看是呈日趋减弱态势,但实际上则是转向了新的形态,即由外向性传播逐步转向内涵性传播——政治“喉舌”角色日渐由前台向后台退隐。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电视新闻改革,作者总结性地指出,其实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强化“守望者”角色和不断优化“喉舌”角色的过程;作者还进一步认为,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的总体趋势,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电视新闻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细细考量,这样一种规律性认识应当说是高屋建瓴的,也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对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具有启示作用或参考价值的。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由方汉奇先生担任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这篇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我想毕竟只是一篇博士论文,不能求全责备,却也不可过高估计。总体上看,由于论文的研究视角相对宏观,所以导致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不足,因而其理论说服力也就不能不受到影响。

作为父母,无不盼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作为老师,自然也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栋成梁。艾红红是北京广播学院招收培养的

首届博士生之一,学校、老师都对她们寄予厚望,一直在关注她们的成长。从几年来的表现看,艾红红一贯勤勉敬业,属于那种能够坐住冷板凳的青年;为人处事方面,她也总是朴实、低调,从不妄言、虚张,这些都是她的突出优点,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良好素质。然而任何人都是有其长也必有其短,作为她的指导教师,从培养一个成熟的学术带头人的角度考虑,我希望她今后在发扬某些“所长”的同时,也能够有意识地弥补一下自己的“所短”,如适当改变一下拘谨、内敛的性格,说话、做事再大胆一些,思维、写作再放开一些,适当加强一下外向开拓意识,提高一下社会交往能力等等,我想这也许会更有利于她的成长。

艾红红还年轻,相信她不会辜负师辈们的期望,会不断总结、不断超越自己的。

是为序。

赵玉明*

2003年5月于北京广播学院

* 序作者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事业的历史回顾	(3)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事业发展鸟瞰	(18)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内容与方法	(25)
第一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初步展开	(29)
第一节 拨乱反正,初步走出“左”倾政治阴影	(31)
第二节 纵横联合,广开新闻信息渠道	(38)
第二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多向拓展	(47)
第一节 更新观念,拓宽电视报道领域	(49)
第二节 多向探索,改进新闻传播方式	(59)
第三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全面深化	(69)
第一节 干预社会,加强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	(71)

第二节	寻找“定位”,彰显电视传媒特色	(78)
第三节	调整结构,全面追赶世界先进	(85)
第四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的内容结构转型	(91)
第一节	经济新闻的崛起	(94)
第二节	社会新闻的繁荣	(100)
第三节	时政新闻的创新	(104)
第四节	当前我国电视新闻的内容结构分析	(109)
第五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的形式结构转型	(115)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电视新闻形式的演变	(117)
第二节	当前我国电视新闻的形式结构特征	(125)
第六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动因探析	(131)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推动	(133)
第二节	电视事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150)
第三节	科技进步的影响	(152)
第七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规律试探	(157)
第一节	由一元至二元:新时期电视新闻的角色变迁	(159)

第二节 由显转隐:政治“喉舌”角色日渐隐幕后	(168)
第三节 从弱到强:社会“守望者”角色逐步走向前台	(178)
第八章 我国电视新闻深化改革的宏观展望	(183)
第一节 新世纪我国电视新闻传播所面临的挑战	(185)
第二节 我国电视新闻深化改革的宏观思考	(192)
主要参考文献	(203)
附录一 1978 年以来我国电视台与电视新闻 数量增长情况一览	(214)
附录二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大事记	(215)
后 记	(253)

导 论

- 改革开放前
我国电视事业的历史回顾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电视事业发展鸟瞰
- 本课题研究的
意义、内容与方法

所谓“新时期”，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中国化的概念，指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时段。所谓“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也即为1978年以后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发展。

我们知道，电视新闻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新闻的发展寓于电视事业发展的的大系统之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电视新闻业的总体发展状况固然与其科技实力密切相关，但从其意识形态属性上说，由于它是电视人通过电视手段对正在变化的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一种最具政治性与现实感的电视节目类型，因而必然要受到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和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深入地研究、探讨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洞察其发展规律，就必须从新时期电视新闻所处的媒介环境谈起；更进一步说，则应从我国电视事业诞生的历史背景谈起。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事业的历史回顾

电视是20世纪的重大发明。一般认为，1936年英国BBC电

电视台的正式开播,是世界电视事业的誕生日。几十年来,由于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电视事业体系,各个国家(或地区)都自觉不自觉地从不方面对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以各自的成就和特色构筑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电视文化景观。

中国大陆的电视事业开始于1958年,这年5月1日,国内首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试播成功^①。以此为起点,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与我国总体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电视事业作为一项由政府投资兴办的事业,是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规划下,主要依靠国家拨款,根据统一的行政指令按计划建设和发展的。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指令式发展

在中央台试播成功后,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也分别于当年10月和12月建成开播。1958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电视台。到1961年,全国已有19座省市级电视台建成开播。但次年由于国民经济发生困难,贯彻国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电视事业也采取了压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等相应措施,电视台数目一度锐减到只剩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沈阳5座。直到1966年底才恢复到13座。

1970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会同有关工业和电信部门,召开了全国电视专业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将集中主要技术力量研制彩

^①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9月2日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为了与现在的“北京电视台”(1979年5月开播,属北京市)加以区分,以下称原北京电视台为中央电视台,简称中央台。

色电视,同时适当发展黑白电视。之后,对彩色电视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以及恢复和新建电视台,成为中央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工作的重点。1972年,在自创彩电制式的有关技术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经报请国务院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派出有关技术人员,专程赴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荷兰和英国,考察他们的彩色电视制式,并对选购国外彩电设备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讨。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1973年5月1日,中央台的彩色电视节目开始试播。8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10月1日,天津电视台、成都电视台也开始了彩电试播工作。在电视台建设方面,1970年10月1日,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广西和福建等6个省区新建成电视台或实验电视台,并开始电视广播。至此,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所有省、自治区都有了电视台。这一年,全国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由1969年的25座发展到70座,中央台的节目传送范围也从1969年的天津、河北、山西、陕西4个省、市扩大到15个省、市,加上高山调频电视转播台的建设,电视信号基本覆盖了全国省会、自治区首府和大城市。而到了1978年底,我国已设立的电视台就已经有32座,电视转播台224座,同时一小批电视差转台也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①

电视事业是一项重装备、大投入、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实质性发展。我国电视事业却是在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下起步的,因而其集中统一的管理运作模式显示了它的突出优点:国有国营,按计划发展,不仅可以较好地发挥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按比例进行资金的投

^①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内部资料《1949年~1978年广播事业统计资料汇编》(1981),第6页。

人与事业的建设,而且能够有效规避由于事业的无序发展或电视台分布不均衡等带来的诸多矛盾。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这种事业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电视台只负责技术与宣传,不负责经营,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过日子,因而事业自身也就很难产生规模发展与扩张的内在需求,只能依据上级政府的指令要求被动发展,长期处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状态。这样的机制,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电视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一旦某些指令出现失误时,还会直接影响到事业的健康运行。

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政府对电视事业建设下达的很多指令、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明显不符的,但出于政治考虑,许多电视台在进行各项事业建设时,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既不讲效益,也不计成本,有的甚至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电视台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维持这些庞大机器运转的巨额费用却得不到基本保障,更不用说提高电视的有效覆盖率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从普通百姓角度看,购买节目不多、接收不良,却又价格不菲的电视机无疑也是得不偿失的选择。因此,至改革开放前,与电视台建设的初具规模相比,我国电视机的普及率却一直很低:1958年电视事业起步之时,全国仅有50台电视接收机;1973年彩色电视试播时,也才只有300台彩色电视机。直到1975年底,偌大的中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也只达到46.3万台,按当时全国人口7.2亿计算,平均1600人中还拥有不到一台电视机。^①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前电视台建设和彩电技术攻关所取得的成就,虽然表明了政治需要和政府行政控制对大众传媒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电视事业总体状况的落后,又恰恰说明对于大众传媒发

^①于广华主编:《中央电视台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推动以先进科技为手段的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不应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追求和规划电视事业的发展。

二、以传者为中心的偏于政治化的传播

如果说电视台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以及电视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电视事业“硬件”建设的话,那么,电视传播的观念与组织、内容与形式则应属于电视事业的“软件”建设。这是电视事业发展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上述“硬件”建设——即事业建设指令性、计划性特征的必然延伸,至改革开放前,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无产阶级的舆论宣传工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电视台的宣传方针和任务,都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由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统一部署的,因而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传者为中心的偏于政治化的取向。

在中央台试播前夕,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给中宣部、国务院并转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北京电视台(中央台)“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在实验期间,电视广播很难担负起党的各项宣传任务,但在定期的播出节目中,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观众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①。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①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

对电视传播的这一职责定位还是实事求是、也比较全面的。

然而众所周知,自 50 年代末期起,由于党和政府在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失误,导致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严重偏移。反右、“大跃进”等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严重冲击了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也使电视传播从一开始就染上了较为浓重的政治宣教色彩。以中央台试播第一天的节目单为例,这一天,在仅有的 8 个节目(总时长 1 小时左右)中,除了一个 20 分钟的舞蹈节目和一部苏联科教片《电视》外,其余全是配合形势的政治宣教片。其后,经过 1962 年的结构调整和 1964 年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电视传播中“左”的倾向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各电视台节目的质量与花色品种等也都出了一些改进。但总起来看,由于此后国家对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行政化管理、控制渐趋严格,致使电视工作者的思想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束缚。在这种新闻传媒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运行机制中,国家政治生活的种种非正常现象,以及党在某些时期的政策失误和指导思想偏差,也都无一例外地在电视上有所反映,从而直接影响了节目的质量与效果,降低了电视媒介的公信力。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把持下,电视传播更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媒介传播的基本规律。当时,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大众传媒,都普遍存在着只贯彻、传达上级意图,不反映、也无视人民群众要求的现象,陷入了由传播者一方自说自话的信息运行“单行道”状态,使得媒体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一定社会的媒介传播事业总是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传播中的上述政治化、单一化取向,主要就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50 年代中期,我国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逐步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